

## 因涉嫌进行与活力门公司相关的股票内幕交易，日本当局今日或逮捕日本“民间股神”村上世彰

□本报记者 周周良

因为一个名叫村上世彰(Yoshiaki Murakami)的中年人，东京股市上周五经历了“半日惊魂”：日经225指数上午一度跌去236点；数十只与村上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股票放量下跌；跌势一度惊动日本财政金融大臣与谢野馨出面澄清……

类似的情形在几个月前“活力门事件”曝光时也曾上演，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不再是堀江贵文，而是日本著名基金公司MAC资产管理公司(又称村上基金)创始人村上世彰。日本经济新闻上周五首先披露，由于涉嫌在去年买卖日本广播公司(NBS)股票时参与和活力门公司相关的内幕交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已对村上世彰本人和村上基金展开调查。共同社昨日的报道则称，检察部门可能最早在今天逮捕村上。

## 村上基金疑串通活力门

事情还得从2005年初活力门公司与富士电视台争夺NBS控制权说起。

2005年2月8日，活力门通过场外交易收购了大量NBS公司股份，后者的股价也一度大幅飙升。而村上基金此前已买入NBS股份超过5%的股

份，并在股价大涨后获利平仓，取得了不菲的收益。

而目前检察机关怀疑，村上基金事先从活力门公司得到了关于上述股权收购的内幕消息，在预计NBS股价会因而大涨的情况下，才临时大量买入NBS公司股票。而活力门前高管人士也已承认，事先曾将公司对NBS的收购方案透露给村上基金。

目前，东京检察院特别搜查部正在加紧查阅活力门公司的存档文件和村上基金的证券交易纪录等相关资料，以确认可能存在的违规交易。

有业内人士猜测，在对NBS公司股票的买卖上，村上基金与活力门公司有着某种默契。因为最终村上基金所持有的NBS股票，有相当一部分出售给了活力门公司，后者当时正在竭力扩大对NBS的控股权。

## 维权人士?民间股神?

如果说堀江贵文是日本产业界的楷模，那么村上世彰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日本股坛的一个“神话”。

“有些散户只是因为听说村上基金买了哪些股票，就跟进买入。如今这些人都在忙着平仓，因为村上可能永远不会再买股票了。”在村上被调查的消息传出后当天，一位日本当地的著名分析师这样表示。

■新闻背景

## 活力门事件回放

2006年1月16日，日本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活力门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遭到日本警方搜查，进而引发了日本股市的一场“大地震”，致使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在随后三个交易日内暴跌1114点，市值损失逾3000亿美元。18日，由于抛盘过大并超过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处理能力极限，东京股市不得不宣布提前停止交易。19日，一名涉及活力门公司交易的证券公司老总横尸宾馆。

1月23日，日本首都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以涉嫌利用做假账等手段欺骗投资者及违反《证券交易法》为由，逮捕了活力门公司总裁堀江贵文及其他三名公司高管。

2月13日，东京地方检察院以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的罪名正式起诉活力门公司前总裁堀江贵文等四名嫌疑人。

在堀江等人拘押期满的3月14日，东京地方检察院以有价证券报告造假罪对堀江贵文等5名活力门高管以及活力门公司提起诉讼和追加诉讼。丑闻曝光后，活力门公司的股票持续大幅下跌，并于4月14日被正式摘牌。

被称为“日本比尔·盖茨”的活力门公司总裁堀江贵文，是日本经济产业界的风云人物，曾被认为是日本创业者

的楷模。1996年，还是在校大学生的堀江贵文创建了活力门网站。此后该网站迅速发展，于2000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跻身日本三大门户网站行列。除门户网站之外，活力门公司还拥有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网络金融等业务，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信息通信企业集团。截至2005年9月底，该公司已经拥有44家子公司，销售额达784亿日元。

堀江在经济产业界的声望甚至惊动了日本首相小泉一郎，后者去年曾力邀堀江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以期提升自民党的支持率，但遭到拒绝。

(文青)

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坐拥资产规模超过4000亿日元的MAC资产管理公司，村上在日本股市已到了能“呼风唤雨”的地步。“村上系”公司(村上持股的上市公司)遍布日本各行各业，从电视广播到高新科技，从物流仓储到造纸食品，仅是村上持股企业就超过5%的日本上市公司，就有21家之多，累计持股市值超过2500亿日元。

在投身股票投资前，村上曾任日本产业经济省官员，初涉股坛的村上最早是以推动股东权益而一举成名，至今，村上仍被视为日本股市最知名的股东维权人士。不过，现在他所做的更多是“挟股权以令董事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股份影响公司经营。

在村上被调查消息披露当天，日本股市平日便跌去236点，村上持有的股票无一例外大幅跳水，有的股票甚至跌至半年来新低。只是因为美国加息预期降温，日股上周五下午才成功收复失地。

日本财政金融大臣与谢野馨上周五专门出面辟谣，称并未获得有关村上基金遭调查的信息，但这更多可能是为了避免再度出现“活力门”时期的市场震荡。村上事件会不会成为又一个“活力门”，还要看事态后续发展。

## 尼钻井遭袭 油价70美元再上两级

□本报记者 王丽娜

伊朗核问题目前仍不明朗，非洲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局势又再趋紧张，再度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上周五大幅上扬，由之前的70美元左右上涨近2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19美元，收于每桶72.33美元，为5月11日以来最高水平；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4美元，收于每桶71.03美元。纽约商交所7月份交货的取暖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4.38美分，收于每加仑2.0145美元；7月份交货的汽油期货价格上涨7.03美分，收于每加仑2.1975美元。

事实上，国际油价攀升的原因主要是伊朗核问题令美伊陷入僵局，从而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过，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最近似乎有所缓和。美国国务卿赖斯上周表示将有条件参加与伊朗政府的多边谈判。

■美股一周谈

## 市场日渐理解联储反通胀立场

□特约撰稿 张羽 发自美国

尽管美国股市在最近的大跌后略有反弹，但上周的经济消息却不能给投资者较为清晰的前景展望，使股市先跌后涨。

统计一周交易，道指下跌0.27%，收于11247.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指则分别上涨0.63%和0.41%，收于1288.22点和2219.41点。整个5月份，道指下跌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1%，是1984年以来22年中跌幅最大的5月份，而纳指更是重挫6.19%，是200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5月份。

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引起投资者的困惑。5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远低于预期，建筑业和制造业数据则显示行业大幅降温。虽然零售业整体上表现还算不错，但中等偏下消费能力为主的零售业龙头沃尔玛却调低当月业绩，显示高油价已威胁到这部分消费者。

尽管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放缓，市场也预计美联储加息循环已近尾声。但最近召开的议会会议声明警告需进一步加息，甚至50个基点，以应对通胀压力。在这些不确定因素继续存在

的情况下，加上伴随夏季休假的交易淡季到来，投资者将比以往更为小心，过去一周不稳定的交易状况就是一个证明，它显示出投资者在投资股票时犹豫不决的心态。估计这种不确定因素将持续到本月28、29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决定公布后才能消除。在此之前，投资者能做的就是根据最新经济数据猜测利率提升的幅度。

一般认为，当美联储表示将暂停或终止升息时，股市会上升。但当年1984年以来22年中跌幅最大的5月份，市场在短暂下调后便恢复升势。这说明市场赞同联储以打压通胀为首要任务的政策。通胀无疑已广泛存在于经济活动中，因此，需要以适当减缓经济增长为代价，通过每次小幅度的加息，把通胀控制住，从而避免当通胀失去控制时再大幅加息，严重损害经济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目前的市盈率为17，是1996年以来最低的。以今年的预估盈利计算，指数的市盈率还不到15。即使由于经济增长减缓，使公司盈利略微减少，美国股市仍很具有投资吸引力。

欧佩克上周四也宣布，将维持目前日产量2800万桶的限额不变，同时将密切关注市场情况，防止油价出现剧烈波动。



村上世彰

## 『活力门第二』惊现日股

■链接

## 村上其人

村上世彰1959年生于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198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随后在日本产业经济省任职。1999年，村上离职并创办了M&A咨询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村上基金。2002年，作为服饰厂商“东京style”最大股东的村上基金强烈要求增股而一度引起公众注意，村上本人也以其犀利的言行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利用作为投资基金公司可获得部分企业内部情报的特权，数年来，村上基金采取大量收购潜力股、待股价上涨后又悉数抛出的手法迅速积累财富。据估算，起初仅有40亿日元运营资金的村上基金如今至少已拥有了4000亿日元。(文青)

## 治理电信欺诈要耗费半年吗

□魏也

针对近期广大电信用户反映强烈的六类移动信息服务业务价格欺诈问题，信息产业部联合中国消费者协会从6月份开始，用半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治理和规范移动信息服务业务资费行为和收费行为专项活动。

电信欺诈问题，早已令消费者深为不满，相关投诉直线上升。问题是，这场姗姗来迟的专项治理活动，有必要耗费长达半年之久吗？有关电信欺诈伎俩，透过消费者的投诉就可以一目了然，通过这些为数众多的第一手资料，即可直

接对电信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设计相关制度，避免电信企业继续欺诈消费者，何须再给电信企业留下长达半年的喘息之机？

事实上，信息产业部现在才着手对电信的欺诈行为进行查处，已经让消费者“等待了太久太久”。近年来，消费者饱受电信欺诈的侵害。河南省质监局抽检的结果显示，2004年该省的几大电信运营商计费话费差错率超出国家标准上千倍，一年至少多收费1亿元。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陆锡嵩更是拿出确切数据，说明电信欺诈问题的严重性：“全国每年产生的电信欺诈性收费高达70亿元以

上。能够通过投诉或诉讼获得返还的数额微乎其微。”

对此，信息产业部不可能不知道，为何一直拖到现在才行动？既然行动了，为何不及时对电信欺诈行为进行处理，还要耗上半年时间？这反映出相关部门工作效率的低下，而效率低，必然造成政府运行成本的上升。6月3日，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特别强调，中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价的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诚如李金华审计长所言，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低下，不仅造成了运行成本的高昂，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也由于没有及时对侵害纳税人权益的行为进行查处和制止，而使纳税人额外付出高昂成本。以电信欺诈为例，如果有关部门在消费者大量投诉的问题一出现，即认真调查，严加处理，必然会促使电信部门依法经营，不敢肆意欺诈消费者。但是，我们看到的并非有关部门的快速行动，而是迟迟不动，这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即使那些付出了高昂维权成本的消费者，也常常由于有关部门的不及时作为而导致维权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电信部门又怎么可能收敛自己的欺诈行为？当电信运营商计费话费差错率超出国家标准上千倍，谁能说这不是故意

而为之？

其实，消费者更期待的，并非持续多久专项治理活动，他们更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完善相关法律和相关制度，建立起长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以促进电信部门依法经营，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这种长效机制下，任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都将迅速受到惩处。

如此，不仅政府运行的成本和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大降低，也将使依法经营的理念深入人心，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因而，长达半年的专项治理活动，时间至少可以缩短一半，与其空耗，倒不如将宝贵的时间用于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来得更有意义。

## 重大决策也要有不可行性研究

□周金海

6月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指出，很多人认为“只要不把钱装进个人腰包就没事”，但领导人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说，很多单位浪费太多，盖一个办公楼要花几十个亿。今年2月，李金华审计长在海南调研时也曾表示，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带来的危害有时并不亚于贪污腐败。

目前，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由于决策失误，全国地方政府债

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决策失误在我们国家何以如此严重？

我认为，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决策机制漏洞太多。二是决策问责制度缺失。前者，增大了决策失误的几率，使决策失误看起来更像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结果。而后者，则导致决策者权责不对等，他们只承担由正确决策所带来的收益，而不必承担由于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这使得他们常常无所顾忌。

要预防重大决策失误，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在一些西方国家，因决策失误——甚至很小的决策失误导致的官员引咎辞职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与西方国

家严厉的问责制度有关，一旦决策失误，决策者不仅面临公众的抨击、议会的质询乃至罢免，甚至还可能遭到司法的审判。而引咎辞职则可以得到公众的谅解，但是，对于重大决策失误，哪怕决策者辞职，也将遭到公众和司法机关穷追不舍地调查和追究。

正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制度先进国家的决策者，更注重科学的和民主的程序，他们常常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对决策项目进行全方位的评估，甚至就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进行全民公决。如此，整个决策过程就变得高度透明，决策失误就不容易发生。

这其实是一种倒逼机制。即在严厉的问责制度下，迫使官员们在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进行细致深入地调查研究，获取每一点对决策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并通过民主程序，使决策更趋科学与合理。但在我国，由于问责缺位，官员们没有提高决策透明度和科学性的动力，导致领导者责任心不强，决策时大搞“一言堂”，使民主程序形同虚设，最终形成了“一把手”独断专行，一人左右决策的畸形决策机制。

事实上，许多决策失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西方国家施行的可行性研究与不可行性研究的配套决策机制，就能很好地避免决策失误

的发生。而我们国家在决策时，基本上做的都是可行性研究。由于决策往往是领导意志的体现，论证小组自然选择投其所好，通过可行性分析，来保持与决策者的一致，而对不可行性因素则避而不谈，甚至伪造数据、歪曲事实，将可行性研究变成了官员贯彻自己意志的工具。决策焉能不失误？

这种可行性研究根本不具备决策参考价值。所以，我们也必须尽快建立不可行性研究，通过可行性研究与不可行性研究的对比，更能对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外，还要建立严厉的问责制，建立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机制，尽量避免决策失误的发生。

## 转移支付应走向法制化

□林江桦

在6月3日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对中央转移支付提出了质疑：中央转移支付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村庄，渠道很长，这个水渠是要“渗水”和被“截流”的，有时候水流到村里就没有了。李金华透露，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甚至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近年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2000年投入800亿元，2001年多于1000亿元，2002年的投入已经大于4025亿元，到2005年，中央实际转移支付已达到了7733亿元。但是，问题也在增多。“渗水”、“截流”、“下落不明”甚至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归根结底，是由于法律监督缺位造成的。

当今世界，凡是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国家，无不是以法律作为保障的。我国转移支付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可以归结到事权不明确、问责不力等方面，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使财政转移支付步入法制化轨道。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是建立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我国目前对财权的划分比较明确，但对事权的界定模糊不清。李金华审计长说，“要对地方进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就必须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得非常清楚。”而对事权的确认，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才更有权威。事实上，西方国家也大体是《基本法》对各级政府事权划分的原则是：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统一进行处理

的事务，由联邦政府负责；其他的事务原则上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如此划分，一目了然。

转移支付的计算也需用法律来规范。比如，为了照顾各个地方的既得利益，从1994年起，中央对各地的税收返还采用了基数法，形成了一省一率、一省一额的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合理的衡量标准，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样一来，哪个地方会“跑关系”，哪个地方得到的拨款就多，各地驻京办事处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中央转移支付款项掌握在各个部委手中，它们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是“驻京办”的重点公关对象。“驻京办”跑“部”“钱”进，为本地区争取拨款，这不仅导致了转移支付的畸形运行，也助长了腐败。

而世界发达国家，大都依法明确规定了转移支付的数额，消除了暗箱操作存在的空间。比如，日本的《地方预算法》，对各类拨款的主要测算依据和具体的补助办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德国，转移支付的系数须由立法机构讨论确定，法律明确规定了转移支付的目的、范围及相关技术性的问题。美国更“省事”，它们采取人均收入法来确定转移支付金额，操作简单、易行。

在我国制度运行依然不够规范、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采用世界上普遍实行的“因素法”，通过一定的公式来核定拨款额，可以大大减少人为因素，缩减部委的自由裁量权，使转移支付支出更加科学与规范。同时，也需要依法构筑起严厉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对转移支付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对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以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大大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